

中国与跨国生产——近现代的比较与启示

孔祥龙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市杨浦区，200082；

摘要：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在主权受损的情况下被强迫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其中最低端的边缘一环遭受剥削，而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主动参与跨国生产，成功实现了以跨国生产驱动自身发展，在跨国生产中还实现了从单一的东道国到东道国兼来源国的身份转变。历史比较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趋利避害，抑制了跨国生产对本国的负面影响，主要归功于对外部压力的抵制和积极的政策调节，而这种政策自主性的基本前提则是国家主权的完整。

关键词：跨国生产；跨国公司；境外投资

DOI：10.69979/3029-2700.25.04.060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纳入全球生产体系，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主动融入全球跨国生产体系。这两次纳入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跨国生产的原始阶段和大发展阶段，而中国在这两个时期内的全球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受到的影响也天差地别。本文试图对于两个时期中国参与跨国生产的方式及其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启示。

1 近代中国的跨国生产

跨国生产在中国，是作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外国资本涌入中国这一大的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出现的。只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完整主权的丧失，西方列强才得以进入中国的市场，对中国进行投资，将中国作为原料的来源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跨国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以前，世界范围内跨国生产的程度都十分有限，用于生产制造业的投资所占份额更少。近代的外国在华跨国生产符合这一总体规律。近代外国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占比在1894年、1914年、1930年、1936年分别为18.0%、42.4%、35.3%和27.5%，均显著低于第三产业（外国对华的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而在第二产业以内，外国对华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和制造业，后者除了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造船业以外，主要是纺织、面粉、造纸、农副产品加工等轻工业。因此，西方在华生产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中西贸易而构建的。

这一时期，西方与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关系仍然属于传统的中心——边缘关系。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资本的西方是生产的中心，而中国则主要作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西方出口制成品的接受方。尽管西方在中国投资建立了许多轻工业制造工厂，但这些工厂的生产力远无法与西方相比，且它们制成的纺织品、火柴之类产品主要面向中国市场倾销。只有在中国采出的矿产品才会大规模向西方出口，处于跨国生产链的最低端。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跨国生产主要呈现为西方提供直接投资以及技术、机器等生产资料，在地生产、在地销售的形式，程度十分有限，产业链跨国分工不明显，而且产业结构高度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体系。

2 早期在华跨国生产的影响

从国家的层面上，西方列强往往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迫使中国让出主权，通过如允许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给予西方企业采矿权等方式开放跨国生产。这为西方各国创造了资本扩张的新去处，满足了列强获取原材料来源和商品出口市场的需求，其在中国经营利润使中国的财富不断流回母国。在次国家层面，许多企业和个人通过在华生产赢得了巨额利润。列强争夺对华贸易特权以及相关的跨国生产的利益，会导致其内部冲突，但跨国生产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一方面造成丧权辱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培育了民族工业，有助于打破旧的社会结构。

西方将中国纳入跨国生产的一部分，带有掠夺性质，这既是中国主权丧失的结果，而当时跨国生产的不平等性会使中国维持积贫积弱的地位，更削弱中国维护自身

主权的能力,陷入恶性循环中。这种局面既可以由资本主义牟利的本性促使,通过私人企业的商业活动自然形成,也能由国家有意塑造,作为对中国实行政治控制的政策工具。后者的典例,就是日本为了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大规模投资建厂、实行日货倾销的手段。

但是,列强在华的跨国生产对于加深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培育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西方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使得财富流向海外,才促使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创办民族工业,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技术人才,为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工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西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在中国创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土壤,许多企业家开始发展民族工业,与西方企业竞争。西方在华的生产和商品倾销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旧有社会形态,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社会力量的兴起无形之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

3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跨国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跨国生产相比于二战以前的原始状态,已经经历了巨大发展。在国际分工以外,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将世界各国的制造业不同程度地整合起来。各国生产的联系不再局限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的形式,出现了各种非股权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跨国生产的领域从少数服务业领域和初级制造业扩展到各行各业,世界性生产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态势。

现代中国参与跨国生产的基本条件与 1949 年以前有着根本区别:当今的中国享有完整的主权和政策自主性,主动寻求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以谋求发展。因此,1978 年后的中国有充分的自主性制定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政策调控使中国在跨国生产中的参与对中国的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这种自主性是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政府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政策自主性意味着,外国资本在参与中国境内的跨国生产经营时,可采用的形式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直接投资方面:直到 2019 年《外商投资法》颁布以前,外国投资者不能在中国开办独资企业,也不能独立经营,而只能与中国企业共同开办合资企业,而且股权份额受到限制。而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外国资本被施加了更为严格的准入限制,以防止事关国

家和民生命脉的关键部门遭到外来垄断。尽管如此,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在国家统计局有数据的第一年 1984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91956 万美元,2009 年为 9003300 万美元,2019 年则升至 13813500 万美元。

中国的企业还以各种非股权形式活跃地参与了跨国生产。在中国仍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全球委托生产和服务外包的重要承接方,深深嵌入全球生产链,这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和资金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跨国资本通过控制跨国公司,实现对跨国生产的控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基本防止了跨国生产被跨国资本完全把持的情况发生,保证了境内生产活动的自主性。如前所述,中国在 2019 年以前的法律法规限制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跨国生产中的参与份额和管理权,因此保证了跨国生产的主导权不被外国资本把持。尽管 2019 年《外商投资法》放松了这些限制,但该法同时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商投资加以管理,并且继续以法治的原则要求外资企业遵守中国法规。

4 当代中国跨国生产的影响

中国融入全球生产链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为 80 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和中国在新时代的跨国生产中,利润获得存在不平等的成分,尤其是在中国总体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时期。不过,这一关系总体是互惠共赢的。西方跨国公司在这一庞大市场的运作,给母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通过将中低端的生产外包给中国,而自身保留核心技术,西方企业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并相应获得了更大份额的利润。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搭了全球化的便车,没有参与跨国生产,就很难有今日中国的工业奇迹。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企业为大批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还起到了培养高素质的工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外国对华投资为中国源源不断地注入发展所需的资本,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促使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提高服务质量,改善营商环境。跨国企业还能迫使本地企业打破惰性,积极参与竞争,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有助于经济环境的总体改善。通过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工业从依附于外国企业的低端状态向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地位升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只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只能占据低端地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下降,但由于劳动力素质高、市场庞大、营商环境较好等因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地位至今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中国在产业链中高端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出口贸易呈现“创新密集型行业主导”的格局。中国在通讯设备、高铁动车等许多制造业领域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在其他有生产能力但尚未占据技术优势的领域也正在赶超。因此,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已经占据了高中低端的全产业链条。

5 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主导的跨国生产

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生产中都扮演东道国的角色,接受外来投资,在本土进行生产。而近年来,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相对资金短缺,中国能够拿出大量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在东道国的角色之外,还成为跨国生产的一大主导者。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14303731万美元,相比于有记录的最早一年(2007年,数额为2650609万美元)增长5倍多。

中国在东南亚、非洲等相对不发达地区已经启动了大量的制造业、矿业、基建等合作项目,成为了资本和技术的来源国。随着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开始向这些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同时促进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达到互利共赢。在欧洲等相对发达的地区,中国的投资活动也已有相当的规模。

既然中国无论作为东道国还是作为来源国,在跨国生产中都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跨国生产的全球治理中自然有能力也有意愿谋求一席之地。“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跨国生产全球治理的一大创举。“一带一路”能够推动中国的资本、产能和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市场,缓解国内的压力;将低端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也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历史上许多国际生产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是掠夺性的,而是将互利共赢作为基本理念,力图以中国的投资和先进技术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扶持东道国的产业最终实现升级。

6 总结与启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跨国生产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主权国家可以利用跨国生产实现经济的飞跃,也可能因为无力抵制其负面效应而陷入积贫积弱的发展陷阱。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被强迫融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这一体系中被掠夺的边缘和底层。究其原因,当时的经济不公平是建立在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之上的,在主权不完整的近代中国,政府无力采取有效的政策降低跨国生产的负面影响。

1978年以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没有实行全面的自由化和去监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也保证了中国没有踏入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的依附式发展陷阱。独立和主权完整使得现代中国能够顶住西方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压力,保持政策自主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计划,将跨国生产的利处最大化,并规避其不利影响,以国家力量引导、扶持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通过深入参与跨国生产,成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用于海外投资,使中国取得了跨国生产的来源国地位,这反过来又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实现了正面循环。可见,独立自主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参与跨国生产实现经济赶超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 [1]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
 - [2]梁华.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74-81.
 - [3]杨德才.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规模与效应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7,(03):917-944.
 - [4]张其仔,许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J].改革,2020,(06):58-70.
 - [5]董磊,张克让.全球产业链中的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03):94-95.
 - [6]喻春娇,张洁莹.中国融入东亚跨国生产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J].亚太经济,2010,(01):11-15.
- 作者简介:孔祥龙(2000-),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安全、网络安全和东亚政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